

引用格式:

金惠双, 刘辉. 人力资本对移民生计适应性的影响研究 [J]. 农业现代化研究, 2023, 44(2): 295-304.

Jin H S, Liu H. The impacts of human capital on rural migrants' livelihood adaptability[J]. Research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2023, 44(2): 295-304.

DOI: 10.13872/j.1000-0275.2023.0030



人力资本对移民生计适应性的影响研究

金惠双, 刘辉*

(湖南农业大学经济学院, 湖南 长沙 410128)

摘要: 易地扶贫搬迁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途径, 探究移民生计适应性对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 利用湖南省凤凰县实地调研数据, 采用多元回归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 分析人力资本对移民生计适应性的影响, 探究人力资本对移民生计适应性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 凤凰县移民的健康状态较好, 但受教育程度不高, 部分家庭抚养负担较重, 移民整体人力资本不强。从生计适应性的角度看, 移民的社会适应程度较高, 心理适应程度偏低, 生计适应性不强。人力资本对移民生计适应性有正向影响, 信贷支持在人力资本改善生计适应性的过程中发挥了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 生计策略多样性在人力资本改善信贷支持关系之间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因此, 为保障易地扶贫搬迁成效持续巩固, 提升移民生计适应性, 提出要完善安置区的治理机制, 加快补齐医疗和教育短板, 推进就业保障设施建设和加大金融支持力度等对策建议。

关键词: 人力资本; 生计适应性; 信贷支持; 移民; 生计策略; 中介作用; 调节作用

中图分类号: F323.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275 (2023) 02-0295-10

The impacts of human capital on rural migrants' livelihood adaptability

JIN Hui-shuang, LIU Hui

(Economic College,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128, China)

Abstract: Relocation is an important way to win the fight against poverty.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xplore the livelihood adaptability of rural migrants to consolidate the results of the fight against poverty. Based on the framework of sustainable livelihood approach and a field survey data of Fenghuang County, Hunan Province,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impacts of human capital on rural migrants' livelihood adaptability and explored the mechanism of human capital on migrants' livelihood adaptability by the multiple regression model, the mediating effect model,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 model. Results show that the health status of rural migrants in Fenghuang County is good, but they are less educated, and some families are with heavy burden. The overall human capital of migrants is weak.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velihood adaptation, the degree of social adaptation of migrants is high, the degree of psychological adaptation is low and the adaptability of livelihood is weak. Human capital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affects the livelihood adaptability of migrants and credit support plays an intermediary role partly in the process of human capital improving livelihood adaptability. The diversity of livelihood strategies play a positive moderating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of human capital improving credit support. Therefore, in order to ensure the achievement of relocation is consolidated continuously and enhance the livelihood adaptability of rural migrants, this paper suggests: improving the governance mechanism of the resettlement area, speeding up efforts to strengthen areas of weakness in medical care and educatio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facilities to ensure employment, and increasing financial support.

Key words: human capital; livelihood adaptability; credit aid; rural migrant; livelihood strategy; mediating effects; moderating effects

2020 年我国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 全国有 960 多万贫困人口完成易地搬迁, 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后扶贫时代, 防范规模性返贫成

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首要任务, 人力资本是影响农户返贫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1]。湖南省出台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和灾情影响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基金项目: 湖南省发改委创新研发课题项目 (2021015)。

作者简介: 金惠双 (1995—), 女, 河北唐山人, 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乡村振兴与精准扶贫研究, E-mail: Jhs@stu.hunau.edu.cn; 通信作者: 刘辉 (1974—), 男, 湖南慈利人, 教授, 主要从事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 E-mail: Liuh1220@163.com。

收稿日期: 2022-12-19; 接受日期: 2023-04-05

Foundation item: Hunan Provinci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Innovati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ject (2021015).

Corresponding author: LIU Hui, E-mail: Liuh1220@163.com.

Received 19 December, 2022; **Accepted** 5 April, 2023

成果的十条举措》《湖南省乡村振兴局2023年度工作要点》等政策文件加快推进易地搬迁移民稳得住、可融入、逐步可致富。但因人力资本禀赋不足、生计策略单一、生产生活资金欠缺等原因,搬迁移民可持续生计非常脆弱,一旦在迁入地生计不适应,那么这些移民极有可能返回原居住地。只有通过完善健康保障体系和加强职业技能培训等手段,改善人力资本禀赋,才能确保移民稳得住、有就业、逐步能致富^[2]。因此,如何发挥人力资本的作用,增强移民生计适应性,已成为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国内外学术界对移民适应性已有较为广泛的研究,内容涵盖适应内涵^[3]、适应状态^[4]、适应困境^[5]和适应的影响因素^[6]等。在国内,移民生计适应性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水库移民和生态移民。生物学中认为“适应”是生物在生理或行为等方面得到适合在特定环境生存的特征,适应总处在不断进行的状态中^[7]。移民适应理论将适应性看成人与环境之间不断被打破又不断趋于完整的相互作用过程^[8],是移民对变化了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做出的反应^[9]。移民的生计适应性研究建立在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的基础上,是对适应理论的扩展。

在影响生计适应性的路径方面,相关文献主要从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层面展开^[10],研究中往往将五大生计资本作为整体,认为现有的资本存量是影响适应策略的关键,进而导致生计适应性结果存在较大的差异^[11]。移民可以通过调节生计资本存量,改进生计方式,从而降低环境变化带来的影响^[12]。生计资本存量和生计策略多样性指数越高,生计转型状态越好,适应能力就越强^[13]。如冯伟林和李树苗^[14]研究了陕西移民社会适应的影响因素,发现人力资本对移民社会适应的影响很大,移民家庭成员劳动力数量决定移民生计活动类型和有效家庭分工,职业教育培训大大提升了移民进行生计转型适应新的经济环境。高博发等^[15]研究发现人力资本数量和质量是降低生计风险的重要禀赋,信贷支持可以提升融资可得性,但也给搬迁初期移民带来还款压力,降低移民的适应性。马艳艳等^[16]研究发现生态移民的年龄、户主的文化程度和家庭劳动力数量显著影响移民正规金融借贷行为,有外出务工经历的移民在有资金需求时更倾向于亲友之间的无息借贷缓解生计困境。王小华等^[17]认为低人力资本水平的家庭借贷需求弱,难以通过信贷支持摆脱收入增长的困境。

已有研究为从人力资本视角解读移民的生计适应性提供了重要的见解,但仍存在可拓展的空间。

一是移民的生计适应性受到劳动力数量、家庭受教育程度等人力资本禀赋与信贷支持的影响,虽然有个别学者注意到人力资本能配置信贷资源,改善移民适应状态,但并未将人力资本、信贷支持二者纳入同一分析框架,探究人力资本和信贷支持对生计适应性联合影响的机制,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移民生计适应性研究的可靠性。二是生计适应性水平会受到生计策略多样性的影响,但已有成果却较少考虑到生计策略多样性的调节作用。因此,本研究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利用湖南省凤凰县的调研数据,拟建立一个集人力资本、生计策略多样性、信贷支持与生计适应性的理论分析框架。采用多元回归模型分析移民的受教育程度、家庭劳动力数量等人力资本对生计适应性的直接影响;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分析信贷支持在人力资本影响生计适应性的过程中发挥的中介作用;运用调节效应模型分析生计策略多样性在人力资本和信贷支持关系间发挥的调节作用。相比于以往研究,本研究不仅利用移民数据验证人力资本对生计适应性的影响,也进一步把信贷支持和生计策略多样性纳入生计适应性的分析中,以期为解决移民的“后半篇文章”从而巩固脱贫效果的可持续,进一步完善相关扶贫政策提供现实依据。

1 理论分析

1.1 人力资本对移民生计适应性的影响

从移民适应理论视角来看,移民的生计适应性不仅是对新生存空间的适应,更是生产方式、社交网络等方面的相应转变和心理感受上的认同。只有移民的生产方式、社交网络和心理感受上逐渐适应新的环境,才能真正适应搬迁后的生产生活^[18]。邵秀军和管欣^[19]认为,人力资本是影响移民生计适应性的重要指标,移民所具有的人力资本差异直接影响他们在安置地利用各种生计资源的能力,导致不同的生计适应性结果。人力资本理论指出,人力资本能对经济起生产性作用,丰富的人力资本可以加速资本的积累,促进个体收入的增加与经济的增长。通常人力资本有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是劳动力数量、劳动者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技术技能等的总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决定了移民在迁入地的适应与融入^[20],人力资本数量多意味着移民家庭能够从事生产,创造价值的人员多,移民的生计适应性不仅通过劳动人口就业创业带来一定的生产性收入,还可以通过社交网络的重建改善心理适应状态。此外,移民的生计适应性往往与家庭劳动力的受教

育水平、健康状况和年龄结构等人力资本质量相关,若移民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和家庭年龄结构等人力资本质量较好,就能更好的掌握生存技能,生计方式迅速向原住民靠拢,提高收入水平;若人力资本质量较差,收入来源渠道不足,生产性收入不高,催生移民的自卑、焦虑等心理不适,降低了移民的生计适应性。可见,人力资本中包含的劳动力数量、受教育程度等要素对移民的生计适应性产生重大影响。基于此,本研究认为人力资本水平对移民的生计适应性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1.2 信贷支持的中介效应

信贷支持反映了移民适应外力冲击和环境变化的过程中,资源的积累和融资能力的改善,信贷支持能力的提升可以加速移民脱离土地的束缚,对促进移民生计适应性的提高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移民有效获取信贷资金支持可以增强家庭的内生发展动力,通过信贷行为优化生产要素投入,可以克服家庭生计禀赋不足的困境,从而带来收入的增长和福利的改善,且生计适应性高的脱贫户受到的冲击更大^[21]。然而,农村信贷市场发展落后,金融机构信贷甄别机制不健全,移民可能高估借贷成本,误认为自己不可能得到贷款而放弃获取信贷支持的努力,成为“无信心借款人”。而人力资本是获取其他资本的基础性条件^[22],与信贷支持具有较强的协同效应^[23]。人力资本水平的改善可以提高移民的信心,增强移民的信贷可得性,特别是在所处的环境发生变化时,移民家庭的人力资本水平发挥了优势力量,不仅可以有效挖掘潜在的信贷资源,通过获得信贷机会将人力资本的未来收益变现获得融资,更是决定了信贷资金的运行效率。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移民,具备稳定的资金流满足到期还款的需要,更容易获得信贷资金支撑生产和消费,进而推动家庭采取适应性措施优化资源的配置结构,降低搬迁初期的心理焦虑,提高生计适应性。具体看,移民家庭整体受教育水平越高,就业技能越强,获取信贷支持越为容易,能借助信贷资金开展生产经营或营利性投资等经济活动提高经济适应程度;移民的健康状态好,具备到期还款的条件,可以通过信贷资金开展生产经营,提高收入水平;移民家庭劳动力数量越多意味着社会网络系统复杂,有更多渠道获取信贷支持来改善生产生活环境,提高社会适应程度。根据需求层次理论,移民在生活环境改善和收入提高等基本需求得到满足后能够产生归属感,而归属感的形成有利于缓解移民的负面心理情绪,提升整体生计适应性^[24]。基于此,本研究认为信贷

支持是联结人力资本与生计适应性的纽带,在人力资本与生计适应性之间发挥了中介作用,通过优化资本的配置,强化两者的协同效应,促进移民生计适应性的提高。

1.3 生计策略多样性的调节效应

生计策略是移民为达到生计目标,依靠可行能力对资源的配置和经营活动的选择,移民家庭生计策略通常具有多样性。生计策略多样性对于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收入水平,改善生计状况具有积极作用^[25-26]。有研究指出,人力资本是生计策略多样性的基础,影响农户的生计策略抉择^[27]。移民家庭在现有人力资本存量的情况下,通过进行多样化生计活动,提高风险应对能力,从而改善获取信贷支持的容易程度,提升生计适应能力。一般来讲,人力资本和生计策略多样性越优的农户获取信贷支持的可能性更强,也更愿意通过借贷行为改善生计状况^[28]。如受教育程度越高,获取各种信息能力越强的移民,更倾向于在经营传统农业的同时,通过本地务工、创业等进行多样化生计活动^[29],一旦面临变化的环境,这样的家庭更愿意通过借贷行为缓解短期困境^[30-31]。反之,劳动力数量越少,受教育程度越低的家庭,生计策略多样性程度越低,难以通过信贷支持化解资金约束的困境。基于此,本研究认为生计策略多样性正向调节人力资本与信贷支持的关系。

综上所述,本研究将人力资本、生计策略多样性、信贷支持和生计适应性纳入同一分析框架,检验人力资本影响移民生计适应性的过程中信贷支持的中介作用,探讨生计策略多样性在人力资本影响信贷支持过程中的调节作用(图1)。

2 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自课题组2020年在湖南省凤凰县开展的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生计专项调查。凤凰县地处武陵山腹地集中连片区,是湖南省搬迁规模较大的县之一。辖区内经济基础薄弱,许多移民生计水平偏低,返贫风险较高。根据凤凰县区域特征和安置规模,选取了禾库镇、腊尔山镇、阿拉营镇、廖家桥镇和箴子坪镇5个镇作为样本镇,采取随机抽样的方法开展入户调查,调研样本基本代表凤凰县的搬迁情况。在收集数据的过程中,采用县、镇、社区工作人员访谈和入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首先与凤凰县扶贫部门负责人、各乡镇干部和社区工作人员进行深度访谈,总体了解当地易地扶贫搬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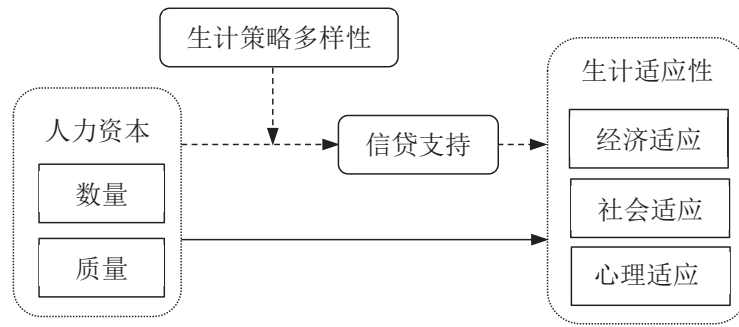


图 1 理论分析框架

Fig. 1 Theoretical analysis framework

情况和农户生计特点，之后对 18 岁以上的移民进行随机访谈。问卷内容主要包括移民家庭人口特征、生计特征、搬迁特征等。共发放调研问卷 557 份，经筛选得到有效问卷 515 份，有效率达 92.46%。

2.2 变量选择

1) 被解释变量。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为搬迁移民的生计适应性。借鉴已有研究^[24, 32]，从经济、社会和心理三个方面构建生计适应性评价指标体系，采用李克特五分量表对农户进行提问，通过熵值法赋予指标权重综合测量移民生计适应性。其中，经济适应主要表现为与移民收入水平相关的变化，选取与搬迁前相比收入的变化程度和未来提高收入的信心进行表征；社会适应主要表现为移民对新生产和生活环境的适应，选取对现在的生产方式、邻里关系和社区环境的适应程度进行表征；心理适应反应出搬迁后移民心理调适的情况，选取对原居住地和原居住地人的怀念程度进行表征。

2) 核心解释变量。本研究的核心解释变量为人力资本。参考已有研究^[14, 33]与调研地的实际情况，选取劳动力数量、家庭成员最高受教育程度、家庭年龄结构、移民健康程度为评价指标。为了避免人

为赋权的主观性，通过熵值法赋予指标权重综合评价人力资本水平。

3) 中介变量。本研究的中介变量为信贷支持。信贷支持是指移民在家庭生产经营的过程中，不需要抵押物品就能凭借信用等级向亲戚、朋友、银行等机构取得借款或贷款资金支持生产生活的能力。借鉴相关研究^[21]，以移民获取借款或贷款的难易程度代理信贷支持相关指标。

4) 调节变量。本研究的调节变量为生计策略多样性。为谋求更高的经济资本，移民通常会选择多种生计策略，以进行多样化生计活动。参考已有研究^[34]，选取移民家庭实际生计活动种类数量衡量生计策略多样性，如单个家庭同时从事农业生产和外出务工，则其生计策略多样性值为 2，以此类推。

5) 控制变量。移民生计适应性因个体特征、搬迁特征和生计环境等状况而具有明显差异。通过对已有文献梳理^[32, 35]，本研究控制变量包括个体特征（性别、年龄、参加公共事务频率、普通话水平）、搬迁特征（社区距城镇距离、搬迁时长）和环境特征（去年是否遭遇自然灾害）三个方面。

以上变量定义及统计结果见表 1。

表 1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Table 1 Variable definitions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与赋值	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生计适应性	使用熵值法测算得出	3.367	0.762
核心解释变量	人力资本	使用熵值法测算得出	0.468	0.214
中介变量	信贷支持	获取借款或贷款的难易程度：1=非常难，2=比较难，3=一般，4=比较容易，5=非常容易	2.944	1.117
调节变量	生计策略多样性	移民家庭实际生计活动种类数量	1.823	0.556
个体特征	性别	1=男性，0=女性	0.689	0.463
	年龄	受访者实际年龄（岁）	48.000	15.313
	参加公共事务频率	1=非常少，2=比较少，3=一般，4=比较多，5=非常多	2.926	1.350
	普通话水平	1=非常差，2=比较差，3=一般，4=比较好，5=非常好	3.058	1.120
搬迁特征	社区距城镇距离	1=>2 小时，2=1~2 小时，3=0.5~1 小时，4=<0.5 小时	3.736	0.495
	搬迁时长	移民实际搬迁时长（年）	1.748	0.773
环境特征	去年是否遭遇自然灾害	1=是，0=否	0.146	0.353

2.3 模型构建

1) 多元回归模型。移民生计适应性为连续变量, 因此构建多元回归模型, 分析人力资本对移民生计适应性的影响。公式为:

$$SJSY = \beta_0 + \beta_1 RLZB + \beta_2 C_k + \varepsilon_i \quad (1)$$

式中: SJSY 为生计适应性; RLZB 为人力资本; C_k 为一系列控制变量; β_0 、 β_1 、 β_2 为模型待估参数; ε_i 为随机扰动项。

2) 中介效应模型。为了检验信贷支持对人力资本与生计适应性影响间的中介效应, 借鉴 Baron 和 Kenny 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逐步回归法构建模型^[36]。公式为:

$$XDZC = a_0 + a_1 RLZB + a_2 C_k + \mu_i \quad (2)$$

$$SJSY = b_0 + b_1 RLZB + b_2 XDZC + b_3 C_k + \lambda_i \quad (3)$$

式中: XDZC 是中介变量; a_0 、 a_1 、 a_2 、 b_0 、 b_1 、 b_2 、 b_3 为模型待估参数; μ_i 、 λ_i 为残差项。

3) 调节效应模型。为了检验生计策略多样性对人力资本与信贷支持关系间的调节效应, 借鉴温忠麟和叶宝娟^[36]的研究构建模型。公式为:

$$XDZC = d_0 + d_1 RLZB + d_2 SJCL + d_3 SJCL \times RLZB + d_4 C_k + \eta_i \quad (4)$$

式中: SJCL 是调节变量; d_0 、 d_1 、 d_2 、 d_3 、 d_4 为模型待估参数; η_i 为残差项。为了避免多重共线性的影响, RLZB 和 SJCL 是经中心化处理后的人力资本和生计策略多样性。

3 结果与分析

3.1 人力资本与移民生计适应性分析

调查结果显示, 样本移民中劳动力数量为 1~3 人的移民家庭居多, 占比 81.75%; 移民家庭成员最高受教育程度集中在初中和高中水平, 占比 70.10%; 移民健康程度较好, 均值高于 3.5; 家庭年龄结构中, 有 223 户移民家庭有 14 岁以下小孩和 60 岁以上老人, 占比 43.30%, 有一定的抚养负担。

样本移民社会适应程度较高, 明确表示非常适应或比较适应现在的生产方式、邻里关系和社区环境的移民分别占比为 79.03%、91.65% 和 92.43%; 而心理适应程度偏低, 对原居住地的怀念程度和原居住地人的怀念程度比较低或非常低的移民分别占比为 25.63% 和 23.50%, 表明样本移民对安置区的归属感不高。人力资本和生计适应性指数均值分别

为 0.468 和 3.367 (表 1), 移民整体人力资本水平不高, 生计适应性不强。可能的原因是, 易地扶贫搬迁移民是特殊的政策性移民, 以贫困家庭为主, 虽然通过易地扶贫搬迁政策, 使移民的生计情况得到巨大的改善, 但移民的教育水平等人力资本还未得到质的提升, 生计策略还处在不断调适的阶段, 生计适应过程相对缓慢。

将人力资本分为 0.333 以下 (低), 0.333~0.667 (中) 和 0.667 及以上 (高) 三段进行统计, 从不同人力资本水平的统计结果看, 低人力资本水平的移民生计适应性均值为 3.127; 中人力资本水平为 3.432; 高人力资本水平为 3.656 (表 2)。结果表明了移民的人力资本水平对生计适应性有促进作用, 拥有高人力资本水平的移民生计适应性更强, 这一结论与已有研究^[20]的结论一致。

表 2 不同人力资本水平下的移民生计适应性
Table 2 Migrant livelihood adaptability under different human capital levels

类型	人力资本	生计适应性	
		均值	标准差
低	< 0.333	3.127	0.743
中	[0.333, 0.667)	3.432	0.693
高	≥ 0.667	3.656	0.795

3.2 人力资本对移民生计适应性的影响分析

估计结果显示, 人力资本对移民生计适应性产生正向影响, 且在 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表 3), 即移民的人力资本水平越好, 其生计适应性程度越高。可能的原因是, 移民的人力资本数量和质量是他们生产决策的基础, 当人力资本水平更高时, 可采取多样化生计活动, 激励其加速调适产生更高的生计适应性。具体看, 劳动力数量、家庭成员最高受教育程度、家庭年龄结构和移民健康程度均对移民生计适应性产生正向影响, 且分别在 1%、10%、1% 和 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表 3), 结果方向与理论分析一致, 具有显著的经济意义。这表明劳动力数量、家庭成员最高受教育程度、家庭年龄结构和移民健康程度对提升移民生计适应性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 并且人力资本的数量和质量越优, 越能促进生计适应性的增长。冯伟林和李树苗^[14]也认为劳动力数量和健康状况等人力资本指标对移民生计适应性的影响很大。调研中发现, 人力资本数量丰富的家庭, 创造价值的人数越多, 学历和身体状况越好, 移民的技术技能越强, 面对变化的环境时更容易转换生存方式, 提高生计适应性。

就控制变量而言, 性别、参加公共事务频率和

表 3 人力资本对移民生计适应性的影响
Table 3 Impacts of human capital on migrants' livelihood adaptability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人力资本	0.711***	0.143		
劳动力数量			0.136***	0.044
家庭成员最高受教育程度			0.067*	0.034
家庭年龄结构			0.093***	0.026
移民健康程度			0.138***	0.039
性别	0.134**	0.062	0.130**	0.059
年龄	-0.002	0.002	0.000	0.002
参加公共事务频率	0.233***	0.025	0.214***	0.025
普通话水平	0.045	0.034	0.024	0.033
社区距城镇距离	0.156***	0.055	0.120**	0.057
搬迁时长	-0.115***	0.042	-0.117***	0.043
去年是否遭遇自然灾害	-0.229***	0.084	-0.218**	0.088
常数项	1.863***	0.251	1.125***	0.290
F 值		26.01		23.34
R ²		0.308		0.347

注：*、**、*** 分别表示在 10%、5% 和 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下同）。

社区距城镇距离对移民的生计适应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农村家庭中男性往往更具有决策权，占据优势地位。因此，与女性相比，男性的生计适应性更强。参加公共事务频率多的移民对政策的认知水平更高，社交网络的重建速度更快，融入新环境的意愿和能力越强。社区距城镇距离近的安置区普遍具有更好的就业、医疗与教育环境，移民对安置区的归属感更强。去年是否遭遇自然灾害对移民的生计适应性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这主要是因为灾害冲击了移民的生产生活，导致收入减少，生活成本增加，生计适应能力降低。已有研究指出，移民的搬迁时长对其适应状况施加正向影响^[35, 37]。本研究发现与此不同，搬迁时长负向影响移民的生计适应性，可能的原因是移民搬迁初期，政府的扶持力度较大。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逐渐放手让移民自我发展。然而，受限于人力资本水平，移民后续自我发展乏力，这种前后对比削弱了移民的生计适应性水平^[38]。

3.3 信贷支持的中介效应分析

依据理论分析，人力资本通过影响信贷支持重新配置资源，进而提高移民的生计适应性。要检验信贷支持的中介机制是否存在，第一步需要检验人力资本对信贷支持的影响，第二步则是检验人力资本、信贷支持对移民生计适应性的影响。

人力资本对信贷支持的回归结果显示，人力资本系数为正，且在 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表 4），表明人力资本水平能显著推动移民获取信贷支持。人力资本、信贷支持对移民生计适应性的估计结果显示，信贷支持系数为正，且在 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作为中介变量的信贷支持回归结果显著，且人力资本的回归系数变小，但仍然显著，说明了信贷支持在人力资本对生计适应性的影响中发挥着部分中介效应。人力资本是移民可行能力的体现，信贷支持能为移民生产发展提供契机，当移民人力资本水平较好时，容易获取信贷支持开展生计活动，

表 4 中介与调节作用机制检验
Table 4 Test on the mechanism of mediation and moderation

变量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人力资本	1.168***	0.199	0.458***	0.140	1.159***	0.198
信贷支持			0.217***	0.037		
生计策略多样性					0.092	0.082
人力资本 × 生计策略多样性					0.719**	0.348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F 值	20.74		33.40		18.66	
R ²	0.241		0.384		0.249	

缓解生存压力，提高生计适应性。调研中发现，人力资本水平更高的移民获取信贷支持越容易，移民家庭参与的就业培训种类更丰富，适应新的生产生活空间的能力更强。因此，不同人力资本存量的移民获得信贷支持的难易程度存在差异，移民通过调整人力资本存量、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获取信贷支持的可能性来改善生计适应性水平。

3.4 生计策略多样性的调节效应分析

估计结果显示，生计策略多样性的系数为正，但结果不显著。人力资本与生计策略多样性交互项的系数为正，且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表4），表明生计策略多样性在人力资本影响信贷支持的过程中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可能的原因是，在移民调适生计适应性的过程中，生计策略的转型需要时间和经验的积累，然而移民的就业技能匮乏，生计策略难以多样化，缺乏风险抵抗能力，不利于获取信贷支持改善生计。而生计策略多样性高，人力资本水平较好的移民，生计策略调适更快，更容易通过信贷支持适应新的生产生活空间。由此认为，生

计策略多样性正向调节人力资本对移民获取信贷支持难易程度的影响，也即生计策略多样性对“人力资本→信贷支持”这一路径起到调节作用。

3.5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分析

生计策略多样性在人力资本影响生计适应性的中介过程中是否发挥作用，有待于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进行检验。本研究采用PROCESS插件，通过Bootstrap自助抽样法对现有样本进行随机重复抽样，抽样次数设定为5000次，检验以生计策略多样性为调节变量、信贷支持为中介变量，人力资本对生计适应性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在生计策略多样性水平较低时，信贷支持产生的间接效应显著，置信区间[0.037, 0.324]，不包含0；在生计策略多样性水平较高时，信贷支持产生的间接效应显著，置信区间[0.190, 0.510]，不包含0（表5）。由此可知，在生计策略多样性的调节程度由低到高时，信贷支持产生的中介效应值始终显著，中介效应呈现增加趋势，效应值由0.165增加至0.338，进一步说明了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成立。

表5 信贷支持在生计策略调节下的中介效应

Table 5 Mediating effect of credit support moderated by livelihood strategies

间接效应路径	生计策略多样性调节程度	效应值	标准误	95% 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人力资本	M-1SD	0.165	0.074	0.037	0.324
→信贷支持	M	0.251	0.063	0.140	0.387
→生计适应性	M+1SD	0.338	0.082	0.190	0.510

3.6 稳健性检验分析

为了确保计量结果的稳健性，本研究采用了替代被解释变量和更换计量模型两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1) 替代被解释变量。本研究将被解释变量用直接测度的移民生计适应性作为替代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直接测度的移民生计适应性是受访者以1~5分对生计适应性进行打分，分值越高表明移民的生计适应性越强。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对生计适应性的正向关系依然显著，模型解释变量显著性水平未发生明显改变（表6）。因此，本研究的结果是稳健可靠的。

2) 更换计量模型。本研究采用分位数回归模型，在10%、25%、50%、75%和90%上的五个分位点进行回归模型分析。估计结果显示，人力资本仍然显著正向影响移民的生计适应性（表6）。尽管少数分位点上的变量显著性有一定变化，但估计结果的细微差异并不影响最终的结论和经济解释。因此，本研究结果是稳健可靠的。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4.1 结论

研究表明，当前凤凰县移民的社会适应程度较高，心理适应程度偏低，整体生计适应性水平不高，

表6 稳健性检验的结果

Table 6 Results of the robustness test

变量	替代被解释变量	分位数回归				
		Q10	Q25	Q50	Q75	Q90
		系数	系数	系数	系数	系数
人力资本	0.426***	0.813***	0.806***	0.780***	0.757***	0.425*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人力资本作为移民家庭的基础性资源,对生计适应性的改善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具体看,移民家庭的劳动力数量、家庭成员最高受教育程度、家庭年龄结构和移民健康程度均是影响移民生计适应性的重要因素。信贷支持可以缓解家庭资金不足的困境,有利于改善移民的生计适应性。

影响机制分析表明,人力资本通过强化移民获取信贷支持的难易程度进而提升生计适应性水平。但生计策略多样性不同的群体,人力资本禀赋对信贷支持的影响关系存在差异,生计策略多样性较高的群体更容易获得信贷支持,移民的生计适应性越强。人力资本、信贷支持和生计策略多样性三者共同形成推进移民生计适应性的合力。

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重点关注了人力资本对移民生计适应性的影响,但影响移民生计适应性的因素多而复杂,且本研究仅以凤凰县为例针对规模较大的安置区移民开展了研究,虽然对以凤凰县为代表的典型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移民搬迁生计适应性研究有一定启发作用,拓展了可持续生计理论的研究内容。但受制于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的分散性和实际访谈的难度,得到的样本量偏小,且移民的生计转型是动态过程,未来仍有更多的研究空间。后续将进一步从生计策略转型的角度,动态分析不同策略转型阶段移民生计适应性的差异,并将从正规金融、非正规金融等多角度,探析不同类型信贷支持对移民生计适应性的影响效果。

4.2 政策建议

1) 完善安置区的治理机制,提高移民的心理适应程度。一是要健全社区治理体系,完善网格化、精细化管理,促进行政治理与移民自治有效衔接,提升移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通过公开选举指导员、网格长等方式激发移民以多种形式参与安置区的日常管理和规划中,提升移民对安置区的认同与归属感,使移民真正融入安置区的生产生活。二是设置心理健康咨询室,鼓励移民积极应对变化的生存环境,定期举办文体娱乐活动,增加社区成员互相认识与了解的机会,为移民重构社会网络提供契机。三是要强化基层工作人员的奖惩机制,通过安排专人回访、发放匿名调研问卷等方式抽查安置区服务人员的工作态度,切实提高为民服务的质量,有效提升移民的心理适应程度。

2) 加快补齐医疗和教育短板,改善移民的生计适应能力。一是要加强社区医疗卫生设施建设,充分发挥健康医疗大数据的作用,优化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环境和服务能力,保障移民基本就医权利,

提高移民的健康水平。二是鼓励安置区与企业、高校、职业院校建立产教融合基地,开展多样化职业教育培训,且要充分考虑到移民的人力资本水平,紧跟迁入地经济发展的趋势,培养与迁入地经济发展相匹配的技术型人才,提升人力资本与生计活动的契合度,促进移民生计策略向多样性迈进,人力资本向高质量发展。

3) 推进就业保障设施建设,提高移民的生计策略多样性。一是要鼓励和引导有实力有意愿的企业走进安置区,在安置区或其周边开办车间,增加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数量,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推动当地产业发展,解决一部分移民的就业问题。二是要引入计件结算工资的工厂,为部分老年人与需要在家照料老人和小孩的青壮年以及残障人士提供灵活就业的机会,拓宽移民的生计策略多样性。

4) 加大金融支持力度,盘活移民的生计资源。一是要设立专项扶持资金,支持银行、农村信用社等金融机构开通低息、贴息贷款服务,降低移民获取信贷资金的成本,推进移民自主创业解决生计问题,从而改善移民生计适应性。二是借助农村金融服务站等机构,加大普惠金融的投入力度,以数字技术赋能金融服务,简化贷款流程,提升移民的信贷可得性,缓解移民信贷约束困境,为移民开展改进生计适应性相关的生产性活动注入资本要素,盘活移民的生计资源。

参考文献:

- [1] 汪三贵,周园翔. 构建有效的防规模性返贫的机制和政策[J]. 农业经济问题, 2022(6): 12-22.
Wang S G, Zhou Y X. Build effective mechanisms and policies to prevent large-scale return to poverty[J]. Issues in Agricultural Economy, 2022(6): 12-22.
- [2] 汪三贵,郭建兵,胡骏.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若干思考[J].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58(3): 16-25.
Wang S G, Guo J B, Hu J. Some thoughts on consolidating and expanding the achievements of poverty alleviation[J]. Journal of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2021, 58(3): 16-25.
- [3] Folke C, Carpenter S R, Walker B, et al. Resilience thinking: Integrating resilience, adaptability and transformability[J]. Ecology and Society, 2010, 15(4): 20. DOI: 10.5751/ES-03610-150420.
- [4] Ando S. Dietary adaptation of immigrant families[J]. Journal of Ethnic & Cultural Diversity in Social Work, 2020, 29(1-3): 238-243.
- [5] 董苾茜. 扶贫移民的社会适应困境及其化解——基于社会记忆理论视角[J].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19(2): 49-54.
Dong B X. Social adaptation dilemma of poverty alleviation immigration and its solution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memory theory[J]. Journal of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 (Social Sciences), 2018, 19(2): 49-54.
- [6] 黎洁. 陕西安康移民搬迁农户的生计适应策略与适应力感知[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6, 26(9): 44-52.
Li J. Livelihood adaptation strategy and perceived adaptive capacity of rural relocated households in Southern Shaanxi Province, China[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6, 26(9): 44-52.
- [7] Scott W A, Scott R. Some predictors of migrant adaptation available at selection time[J]. Australian Psychologist, 1985, 20(3): 313-343.
- [8] 杜云素, 李飞. 外迁水库移民适应的现状、趋势与内在机制——基于湖北荆州和武汉移民安置点的调查[J]. 人口与发展, 2018, 24(2): 31-42, 78.
Du Y S, Li F. The status, trends and internal mechanisms of the reservoir immigrant adaptation: Based on the survey of the Jingzhou and Wuhan resettlement[J].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8, 24(2): 31-42, 78.
- [9] Goldscheider C. Urban Migrants in Developing Nations[M]. Westview Press, 1983.
- [10] Liu W, Xu J, Li J, et al. Rural households' poverty and relocation and settlement: Evidence from western China[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2019, 16(14): 2609. DOI: 10.3390/ijerph16142609.
- [11] 赵雪雁, 介永庆, 何小凤, 等. 多重压力下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户的生计适应性研究——以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为例[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20, 30(1): 140-149.
Zhao X Y, Jie Y Q, He X F, et al. Livelihood adaptability of farmers in key ecological functional areas under multiple pressures: A case study of Yellow River water source areas of Gannan[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20, 30(1): 140-149.
- [12] 李聪, 郭媛媛, 雷昊博.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 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稳定脱贫模式——基于本土化集中安置的探索实践[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41(4): 58-67.
Li C, Guo M M, Lei H B. From poverty alleviation to rural revitalization: A study on the stable poverty alleviation mode of the rural relocated households in the poverty settlement program: Taking localized and centralized settlement as an example[J]. Journal of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2021, 41(4): 58-67.
- [13] 何仁伟, 李光勤, 刘邵权, 等. 可持续生计视角下中国农村贫困治理研究综述[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7, 27(11): 69-85.
He R W, Li G Q, Liu S Q, et al. A literature review of China's rural poverty govern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stainable livelihood[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7, 27(11): 69-85.
- [14] 冯伟林, 李树苗. 人力资本还是社会资本?——移民社会适应的影响因素研究[J]. 人口与发展, 2016, 22(4): 2-9.
Feng W L, Li S Z. Human capital or social capital? Study on the factors of social adaption of the migrants[J].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6, 22(4): 2-9.
- [15] 高博发, 李聪, 李树苗. 后续扶持政策、资源禀赋与易地搬迁农户生计风险——来自陕西省的经验证据[J]. 经济地理, 2022, 42(4): 168-177.
Gao B F, Li C, Li S Z. Follow-up supportive policy, resource endowments, and livelihood risks of anti-poverty relocated households: Evidence from Shaanxi Province[J]. Economic Geography, 2022, 42(4): 168-177.
- [16] 马艳艳, 林乐芬, 杨国涛. 生态移民区农户借贷行为及影响因素分析——以宁夏576户农户的调查数据为例[J]. 学术论坛, 2015, 38(1): 73-77.
Ma Y Y, Lin L F, Yang G T. Farmers' borrowing behavior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in the ecological migration area[J]. Academic Forum, 2015, 38(1): 73-77.
- [17] 王小华, 王定祥, 温涛. 中国农贷的减贫增收效应: 贫困县与非贫困县的分层比较[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4, 31(9): 40-55.
Wang X H, Wang D X, Wen T. Effect of poverty reduction and income growth about loan for rural residents in China[J]. Journal of Quantitative & Technological Economics, 2014, 31(9): 40-55.
- [18] Hutton D, Haque C E. Human vulnerability, dislocation and resettlement: Adaptation processes of river-bank erosion-induced displacees in Bangladesh[J]. Disasters, 2004, 28(1): 41-62.
- [19] 邵秀军, 晷欣. 易地移民邻县安置的意愿、期望与社会适应性[J]. 管理评论, 2019, 31(11): 267-278.
Tai X J, Zan X. The willingness, expectation and social adaptability of migrants to be relocated to neighboring counties[J]. Management Review, 2019, 31(11): 267-278.
- [20] 崔冀娜, 王健. 资本禀赋、公平感知与生态移民城镇融入研究——以三江源地区为例[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20, 34(7): 97-103.
Cui J N, Wang J. Research on capital endowment, fair perception and ecological immigrant's urban inclusion: A case of Sanjiangyuan region[J]. Journal of Arid Land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20, 34(7): 97-103.
- [21] 伍艳. 信贷资本对农户收入增长效应的异质性影响[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2, 43(10): 128-135.
Wu Y. The heterogeneity effect of credit capital on the income growth of farmers[J]. Journal of 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2022, 43(10): 128-135.
- [22] 陈爱丽, 郑逸芳, 许佳贤, 等. 农村家庭人力资本的减贫效应研究——基于非农就业的作用机制[J]. 农业现代化研究, 2020, 41(1): 84-92.
Chen A L, Zheng Y F, Xu J X, et al. Poverty reduction effect of rural household human capital: Based on the mechanism of non-farm employment[J]. Research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2020, 41(1): 84-92.
- [23] 黄志刚, 黎洁, 王静. 贫困区农户生计资本组合对收入影响的优化效应分析——基于陕西778份农户调查数据[J]. 农业技术经济, 2021(7): 79-91.
Huang Z G, Li J, Wang J. Optimization analysis of the combination effect of livelihood capitals on family income in poverty areas: Based on 778 rural households' survey data in Shaanxi Province, China[J]. Journal of Agrotechnical Economics, 2021(7): 79-91.
- [24] 张会萍, 石铭婷. 易地扶贫搬迁女性移民的社会适应研究——基于宁夏“十三五”不同安置方式的女性移民调查[J]. 宁夏社会科学, 2021(3): 163-178.

- Zhang H P, Shi M T. A study on the social adaptation of female migrants in poverty alleviation in inhospitable areas: On the female migration survey of different resettlement modes in the 13th five-year plan period in Ningxia[J]. *Ningxia Social Sciences*, 2021(3): 163-178.
- [25] Ellis F. Household strategies and rural livelihood diversification[J]. *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1998, 35(1): 1-38.
- [26] Li M P, Huo X X, Peng C H, et al. Complementary livelihood capital as a means to enhance adaptive capacity: A case of the Loess Plateau, China[J].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2017, 47: 143-152.
- [27] 刘伟, 徐洁, 黎洁. 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生计适应性研究——以陕南移民搬迁为例[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18, 39(12): 218-223.
- Liu W, Xu J, Li J. Livelihood adaptive capacity of rural households under poverty alleviation relocation: A case study of southern Shaanxi[J]. *Chinese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Regional Planning*, 2018, 39(12): 218-223.
- [28] 苏芳, 尚海洋. 农户生计资本对其风险应对策略的影响——以黑河流域张掖市为例[J]. *中国农村经济*, 2012(8): 79-87, 96.
- Su F, Shang H Y. The impact of rural household's capital for livelihood on the strategy for risk aversion: Taking Zhangye Prefecture in Heihe River Valley as an example[J].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12(8): 79-87, 96.
- [29] 赵文娟, 杨世龙, 王潇. 基于 Logistic 回归模型的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研究——以云南新平县干热河谷傣族地区为例[J]. *资源科学*, 2016, 38(1): 136-143.
- Zhao W J, Yang S L, Wang X.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velihood capital and livelihood strategy based on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in Xinping County of Yuanjiang dry-hot valley[J]. *Resources Science*, 2016, 38(1): 136-143.
- [30] 段小红, 魏瑞兄, 王明珠. 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生计模式变迁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六盘山区两县的调研[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22, 36(6): 25-33.
- Duan X H, Wei R X, Wang M Z. Changes in livelihood models of farmers relocated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J]. *Journal of Arid Land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22, 36(6): 25-33.
- [31] 唐红林, 陈佳, 常翔僖, 等. 政策变迁背景下干旱区乡村适应演化特征与农户生计响应——以甘肃省民勤县为例[J]. *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2, 52(4): 628-642.
- Tang H L, Chen J, Chang X X, et al. Rural adaptation and evolution and household livelihood response in arid area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policy changes: A case of Minqin County, Gansu Province[J]. *Journal of Northwest University (Natural Science Edition)*, 2022, 52(4): 628-642.
- [32] 史梦薇, 王炳江. 民族地区生态移民心理适应的特征及影响因素[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0, 40(2): 68-72.
- Shi M W, Wang B J. Feature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sychological adaptation of ecological immigrants at ethnic areas[J]. *Journal of South-Central Minzu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20, 40(2): 68-72.
- [33] 吴雄周, 金惠双. 生计资本视角下农户生计策略变动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 CFPS 四期追踪数据[J]. *农业现代化研究*, 2021, 42(5): 941-952.
- Wu X Z, Jin H S. The changes of farmers' livelihood strategies 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livelihood capital: Based on the four periods of the CFPS tracking data[J]. *Research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2021, 42(5): 941-952.
- [34] 刘伟, 徐洁, 黎洁. 陕南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生计脆弱性研究[J]. *资源科学*, 2018, 40(10): 2002-2014.
- Liu W, Xu J, Li J. Livelihood vulnerability of rural households under poverty alleviation relocation in southern Shaanxi, China[J]. *Resources Science*, 2018, 40(10): 2002-2014.
- [35] 吴晓萍, 刘辉武. 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经济适应的影响因素——基于西南民族地区的调查[J]. *贵州社会科学*, 2020(2): 122-129.
- Wu X P, Liu H W. Influential factors of economic adaptation of relocated migrants in relocated poverty alleviation: Based on an investigation in southwest ethnic areas[J]. *Guizhou Social Sciences*, 2020(2): 122-129.
- [36] 温忠麟, 叶宝娟. 中介效应分析: 方法和模型发展[J]. *心理科学进展*, 2014, 22(5): 731-745.
- Wen Z L, Ye B J. Analyses of mediating effects: The development of methods and models[J].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4, 22(5): 731-745.
- [37] 张梦尧. 三江源地区生态移民生计转型与心理适应——以青海智格日村为个案[J].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 2022(5): 83-92.
- Zhang M Y. Livelihood transformation and psychological adaptation of ecological migrants in Sanjiangyuan Area: A case study of Zhigeri Village in Qinghai Province[J]. *Journal of North Minzu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2022(5): 83-92.
- [38] 罗凌云, 风笑天. 三峡农村移民经济生产的适应性[J]. *调研世界*, 2001(4): 21-23.
- Luo L Y, Feng X T. The adaptability of economic production of the three gorges rural migrants[J]. *The World of Survey and Research*, 2001(4): 21-23.

(责任编辑: 童成立)